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余虹著. -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1999.8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1307-X

I. 中… II. 余… III. 文学理论-对比研究-中国、西方
国家 IV.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07783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厂
版 次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
字 数	193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目 录

引 言	(1)
---------------	-------

上 篇 总 体 性 比 较 研 究

第一章 道行殊途: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13)
------------------------------	--------

第一节 专论诗艺与西方诗学构架	(13)
---------------------------	--------

第二节 弥纶群言与中国文论空间	(38)
---------------------------	--------

第三节 文论与诗学的不可通约性	(56)
---------------------------	--------

第二章 二维眼界及其语言论基础	(70)
---------------------------	--------

第一节 技艺学与美学:西方诗学的历史转折	(71)
--------------------------------	--------

第二节 实用主义与审美主义的中国文论样式	(76)
--------------------------------	--------

第三节 语言的转向:现代诗思新维度及传统的界限	(88)
--------------------------------------	--------

第三章 生存论立场与二元紧张	(105)
--------------------------	---------

第一节 孔子删诗与柏拉图非诗	(105)
--------------------------	---------

第二节	庄子非文与荷尔德林忧诗	(118)
第三节	文论诗学结构及其生存论基础	(127)

下篇 专题性比较研究

第四章	叙事论:文史哲	(137)
-----	-------------------	-------

第一节	诗史之分:志与事、一般与个别	(138)
第二节	文史哲:历史旨趣与哲学意味	(141)
第三节	文性叙事:文与事	(145)
第四节	作为文学叙事的历史与哲学	(152)

第五章	抒情论:兴与表现	(158)
-----	--------------------	-------

第一节	心性体认的自然感性之维	(158)
第二节	兴起与入情	(166)
第三节	兴会与想像	(169)
第四节	兴喻与隐喻	(172)
第五节	兴咏与天才	(178)
第六节	兴象与象征	(183)
第七节	兴趣与趣味	(188)
第八节	中西抒情论的知识眼界:心学和心理学	(191)

第六章	形上论:道与理念	(201)
-----	--------------------	-------

第一节	中西文论诗学的形而上基础	(201)
-----	------------------------	-------

第二节	原道—宗经文论与原道—自然文论 . . .	(204)
第三节	理念—显现诗学与理念—象征诗学 . . .	(213)
第四节	在形上与形下之间:诗性隐喻与逻辑指称	(225)
第五节	在史与非史之间:万变不离其道(理念) . . .	(229)
第六节	超越之路:无心与入心	(234)
第七章	审美论:美与真	(244)
第一节	阿多诺的问题	(245)
第二节	悲剧与意境	(251)
第三节	审丑主义与游戏主义	(261)
主要参考文献		(267)
索 引		(270)
后 记		(275)
出版后记		(276)

引 言

本课题的研究能否叫“中西比较诗学”？这是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回答趋于否定。

中国学术界已习惯于将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诗学”之间的比较研究称之为“中西比较诗学”，这种习尚相沿日久，很少有人怀疑它的正当性并正视它的学术后果，更没有人认真审理这一误称及其相关研究框架的思想文化根由，尤其是它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关系。

“中西比较诗学”的准确指意或确切表达是“中国诗学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因此，当这一称谓用于“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时，它便暗中断定中国古代“文论”是一种“诗学”样式了。

流行的推论是：“文论”即“文学理论”的简称，“中国古代文论”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简称，由于“文学理论”即“诗学”，因此，中国古代“文论”即中国古代“诗学”。

细而察之，这种貌似合理的流行推论是经不起推论的。

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泛泛而谈的中国现代“文论”之为“文学理论”的简称似乎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将中国古代“文论”看作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简称，或将中国古代“文论”名之为“诗学”则纯属臆断。在现代汉语语境中，“文学理论”和“诗学”这两大表达式的书写样式和读音样式虽系汉语，但它们的概念语义则是

经由对“theory of literature”和“poetics”的翻译解说而从西方译入的,它指述一套西方式的思想意识系统和话语系统。“文学理论”和“诗学”的语义翻译史可表征为百年来直接的西语著述之译本和一系列作为变相译本的“文学概论”、“文学原理”与“诗学”等写作。同样,由这种语义翻译史铸就的“文学理论”与“诗学”的语用史也是在其译界之内进行的。

现代汉语的这一现象表明,诸如“文学理论”与“诗学”这样的汉语语词其概念语义是由非汉语文化所给定与限定的,它特指一套西方的学说。在此,“西方的”这一前置限定是内在于它的修饰中心词“文学理论”与“诗学”的,它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文化边界,任何取消这一前置限定将之变成一种无限定的跨文化共名的做法,或将“西方的”置换成“中国的”做法都是在制造诗学普遍性的神话。

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都是自成一体的文化样式,它们之间的差别是结构系统上的,因而无法通约。对此,我们不妨略而论之。中国古代的广义“文论”是刘勰《文心雕龙》式的“弥纶群言”,西方“诗学”则是亚里士多德式的“专论诗艺”,或专论一部分被名之为诗性的文本言述。中世纪以前,西方虽有广义的“文学”概念,但却没有发展出基于这一概念的广义文学理论,西方“文学理论”的建构史恰恰是“文学”概念的狭义化史,即狭义“文学”概念和广义“诗”概念的合一史。由18世纪美学对“文学”概念的狭义定性而形成的“文学理论”大体等同于“诗学”。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语境中“文学理论”这一译语完全是对应于狭义的“theory of Literature”的,这样的“文学理论”既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广义“文论”,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狭义“文论”。中国古代狭义“文论”要么是基于“文笔之辩”

的文韵文藻之论，要么是基于“诗文之分”的散文论，因而也大异于西方“文学理论”。此外，中国古代“诗论”也不同于西方“诗学”。前者只是作为群言之一的“文类论”，它只论及狭义的诗体，后者则论及最一般的“诗性”言述，因而在体裁上它可以包括狭义的“诗”、“戏剧”、“小说”等文体。更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诗学”在概念的内在结构、运思的文化前提和实践的基本目标上都有根本差异，因而“文论”与“诗学”（文学理论）当是两大各有所指的“专名”。

“中西比较诗学”这一称谓在根本上取消了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思想文化差异，以及现代汉语语境中这两大语词的语义空间差异，独断式地假定了“文论”同一于“诗学”（文学理论）的同一性。

尤须提及的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学术思想不能忽视这样一种语言处境：现代汉语语义空间的二元构成。此二元构成指的是：由汉译西方概念语义的基本语词所构成的语义空间和由承续古汉语概念语义的基本语词所构成的语义空间。这两大语义空间同时并存于现代汉语世界。比如以“文学理论”（诗学）命名的一套语义系统（它由“文学”、“本质/现象”、“形式/内容”、“摹仿/想像”、“实用/审美”等汉译语词构成）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已能有效地叙述一种相应的西方思想；而以“文论”命名的一套语义系统（它由“文”、“道”、“气”、“意境”、“神思”、“风骨”等古汉语语词构成）在现代汉语语境中也能有效地叙述一种相应的中国古代思想。换言之，这两套语言系统在现代汉语世界中都是活生生的。

本来，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完全可以在现代汉语已有的双重语义世界之间进行，名正言

顺地将这种研究名之为“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但何以有人无视这一语言处境以及相关的思想文化差异，不加反省地将上述研究称之为“中西比较诗学”呢？

“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这一说法不仅来自于西方，也只能是“西方的”。当西方人最初将这一说法用于西方文化圈内以指称西方国家之间的诗学比较时，它没有什么不妥，因为无论是法国诗学还是英国诗学都是“诗学”，尽管它们有差异，但那只是同一系统内的差异。然而，当有人将这一称谓用之于西方文化圈和非西方文化圈的相关精神遗产之比较研究时，这种做法的正当性就大为可疑了，因为非西方文化圈中并无什么“诗学”。

在此，最隐秘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是：西方“诗学”是一种真理话语，具有普遍性，因而在逻辑上可以推断非西方文化圈中也应有类似的思想话语，至少可以用“诗学”来称名相关的思想话语。对此，一些明智的西方学人已有所反省。厄尔·迈纳在《比较诗学：文学理论的跨文化研究随笔》一书中就指出：从全球眼光来看，西方式的对文学的理解并不是规律，并不具有普遍性，因而也并不必然处于解释的中心。迈纳还指出：非西方批评家认为西方的标准具有普遍性，表达了他们所渴望的现代性，因此，他们用西方标准来论证他们自身文化的文学实践，实际上所有这些努力都建立在一种不稳定的前提之上。^[1]

对前提的非反省性正是“中西比较诗学”论者想当然地接受“比较诗学”这一名称并以之来命名和规导自己工作的根由，这种非反省性使他们不知不觉地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圈套而轻信了诗学普遍性的神话。

让我们看一下《中西比较诗学体系》“前言”中的一段话：

“‘中西比较诗学’是什么意思呢？‘诗学’并非仅仅指有关狭义的‘诗’的学问，而是广义的包括诗、小说、散文等各种文学的学问或理论的通称。诗学实际上就是文学理论，或简称文论。如果说比较文学指文学的比较研究的话，那么，比较诗学则指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但是，我们何以不用‘比较文艺学’，‘比较文论’，‘比较文艺理论’而偏偏用‘比较诗学’呢？直接的理由固然是返回到古希腊的‘诗学’概念去，但这种返回的意义难道仅仅在于称呼本身吗？事实上，由‘文艺学’、‘文论’返回到‘诗学’概念，包含着一个根本性意图：返回到原初状态去。原初并非仅仅指开端，原初就是原本、本原、本体，因而返回原初就是返回本体”。^[2]

这段话最为明确地表达了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在此，“诗学”显然是按西方样式来理解的，在从“诗学=文学理论”到“文学理论=文论”的推论中有一种非法跳跃，而在将“诗学”视为“本体”并要求“‘文论’返回到‘诗学’概念”的推论中更是充满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独断。也许，论者会说他所谓的“诗学”并不是指西方的诗学，但其如前面的分析，“诗学”（文学理论）一词在现代汉语语境中能说什么，听者能听到什么，并不是以言说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语言言述的这一非主体性甚至会暗中规导研究者的研究路向，使之违背他的初衷。当“中西比较诗学”论者将中国古代“文论”名之为“诗学”之后，他会不知不觉地先行按西方“诗学”模式选择、增删中国古代文论素材，从而虚构出一种“诗学化的文论”，然后将其与西方“诗学”进行比较。由于“诗学化的文论”已非中国古代文论的实事本身，因此，所谓的“中西诗学比较研究”往往是在中国古代文论缺席情形下的比较研究。

综上所述，在现代汉语语境中展开的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要获得一种语言基础和学理性根据，首先

要认真严格地清理语词概念本身,在此基础上,放弃“中西比较诗学”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命名方式以及潜在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与视角。当然也不能就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中国中心主义”,以中国古代“文论”模式来先行对西方“诗学”进行整容,然后进行比较。适当的研究姿态与策略是在承认双方的结构性差异的前提下,既不从中国古代“文论”入手,也不从西方“诗学”入手,而是站在两者之间去进行比较研究。事实上,现代汉语的二元语义空间已经将研究者抛入了这个“之间”,问题在于我们是尊重这一“之间”而采取不取消这一“之间”的比较研究方式呢?还是以非法的臆想让一方吃掉另一方,取消这“之间”,然后进行同一性独断的比较研究?就此而言,无论是以西释中,还是以中释西的阐释研究其正当性都是可疑的。所谓的“中国学派”如果没有这种“之间意识”,只是将“西方立场”置换为“中国立场”,其结果都一样。

事实上,无论是中国文论还是西方诗学都不是比较研究的立足点与坐标。对两者进行比较研究意味着双方都是被比较研究的对象,其中任何一方都无权成为阐说对方的标准而独占这个“之间”,因此,只有在“文论”和“诗学”之外去寻找一个“第三者”才能真正居于“之间”而成为比较研究的支点与坐标,这个“第三者”当然是更为基本的思想话语与知识框架。在这个第三者的支点上确定两者局部的、深度的交汇处,当是比较研究的论说之域,而“第三者”提供的眼界才是我们用来审视被比较双方的参照坐标。

总而言之,要真正推进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诗学的比较研究就必须深入反省“中西比较诗学”这种命名方式和工作方式中隐含的前提,小心谨慎地使用基本语词,尊重历史与语言,警惕

简单的同一性意识,非此,不能名正言顺地将此一工程置于一坚实的地基。

有鉴于此,本课题的研究在称名上十分审慎,我不再用“中西比较诗学”来命名本课题,也尽量摆脱西方诗学的概念诱惑与话语强权,不再用“文学理论”、“诗学”这样一些名称来随意称名中国古代文论,尽可能使用现代汉语中所保留的活生生的古代汉语概念来描述古代的文论意识。

在本书的“上篇”,我首先清理了中国古代“文论”和西方“诗学”(文学理论)的结构性差异和不可通约性(第一章),进而在此差异“之间”以“现代语言论”和“现代生存论”为居于之间的“第三者”,凭此参照深入挖掘“文论”与“诗学”(文学理论)赖以运思成文的语言论基础和内在的生存价值论立场。就此,我们发现文论和“诗学”(文学理论)至少在语言论假设和生存价值论立场上有惊人的相似。它们都徘徊在以“语词与实在”的关系和“语词与语词”的关系为基础的两大语言观的界域之内,并都在感性(情性)/理性、神性(道性)/人性的二元价值论上取独断论立场,因此,深入开掘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文学理论)结构性差异背后的局部相通交汇之处,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因为只有立足于这些相通交汇之处,才可能详细考辨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最为内在的入思之路和言述空间,才可能为两者的有效对话确立一个有意义的支点。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将分别讨论这些问题。

如果说本书“上篇”是对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的总体性研究的话,本书“下篇”则是一种专题性研究。顺便一提的是,下篇专题的确定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它以上篇的研究为基础。具体而言,下篇的前三章分别以“语词与实在”的关系为参照坐标,下篇

最后一章则以“审美与入诗”的关系为参照坐标。考虑到不同题域内比较研究的可能性与任务,下篇各章是各有侧重的。对中西叙事论的比较研究将着眼于两者的历史性建构方式,因为相对于西方叙事论,中国的叙事论不够丰富,具体入微的比较研究意义不大。相反,中西叙事论的建构方式对照鲜明,且意味深长。对中西抒情论的比较研究从细处入手,且深入到范畴比较,因为中西抒情论都相当发达,内容丰富而完备,可比度较大。对中西形上论的比较研究侧重于形上形下之同一性分析与批判,因为形上理论恰恰是形下理论(叙事论和抒情论)的隐秘基础。对中西审美论的比较研究侧重于美与真的存在论区分,因为审美论的当代影响恰恰基于审美与入诗的混淆,有鉴于审美论突出的当代性而加强了批判的力度。

无论哪一类比较研究都旨在揭示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的传统眼界和言述空间,因此,现代思想之维始终是一潜在的背景和参照。在此比照中,中西叙事论将自己显示为“作为史学和哲学的叙事论”,中西抒情论将自己显示为“作为心学和心理学抒情论”,中西形上论将自己显示为“作为道论和理念论的形上论”,中西审美论将自己显示为“作为庄禅之学和美学的审美论。”在此,史学、哲学、心学、心理学、道论、理念论、庄禅之学和美学规划着文论与诗学的知识眼界和入思方式。

所谓“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本书的工作力图经由现象学的意向性还原,在“文论”和“诗学”的根部(意识的基础与条件)进行比较性的考辨,以期为深入理解“文论”和“诗学”探明一些可行之路径。

秘响傍通处,可有思者行?

注 释：

[1] 参见泰特罗《本文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59—60 页。

[2] 黄药眠、童庆炳主编《中西比较诗学体系》，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 页。

上 篇

总体性比较研究

第 1 章

道行殊途：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

“文论”和“诗学”(poetics)分别作为前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现象”和“西方现象”标识出此一时代不同地域思想文化间的深刻差异。在一种相对封闭的时空界域内,中西方有关“文”和“诗”(文学)的思考是那么不同,以至于我们不能轻易去掉“中国的”文论和“西方的”诗学这种前置性地域限制。事实上,正是这种地域性差异为我们返回文论和诗学的历史性事情本身提供了路标。

中国文论的“文”与西方诗学之“诗”(希腊语:poiësis,英语:poetry)指述两大意识系统的意向对象,同时也指述两大思想话语的论述对象。此一对象的不同建构与设定规约着“文论”与“诗学”不同的结构性路向,从而导致了根本的结构性差异。对此,我将主要以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为个案性分析的导引,由此考辨西方诗学与中国文论的对象设定和结构性差异。

第一节 专论诗艺与西方诗学构架

从西方诗学(poetics)到文学理论(theory of literature)的